

答好“三好答卷” 构建“三大体系” 奋力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

王启海



整体修缮保护后的《新华日报》总馆旧址

革命文物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载体,承载着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辉历史,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物工作,作出了“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的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推动革命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方针,守正创新,多措并举,答好“三好答卷”,构建“三大体系”,奋力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保护好为前提,突出“四个强化”,构建革命文物立体化保护体系

保护好革命文物就是保护历史见证,是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根本前提。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坚持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革命文物,突出“四个强化”,推动“联点联片”,实现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全覆盖、立体化保护。

一是强化依法保护。市级层面专门出台《重庆市红岩革命旧址保护区管理办法》和《重庆市红色资源保护传承规定》法规政策,科学编制全国、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个,划定文物保护红线。

二是强化集中保护。统筹推进,策划实施红岩革命文物保护传承工程,覆盖重庆20个区县的85处革命文物。坚持把所属54处文物点串联成线、联点成片,整体打造以红岩嘴、曾家岩、虎头岩为主的“红色三岩”革命旧址群,集中打造以渣滓洞、白公馆、烈士墓为主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群,着力构建“点线群”的文物保护新格局。

三是强化本体保护。坚持遵循文物建筑修旧如旧原则,尽量采用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同时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工艺创新结合,修缮文物本体30余处,最大限度确保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

四是强化周边保护。开展文物保护核心区近600亩土地的确权工作,明确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范围;核定文物遗址开放区域的最大承载量,减轻文物保护压力;拆除文物旧址周边的破

旧房屋40余处,进一步改善文物保护环境。

坚持以管理好为基础,实行“分级分类”,着力构建革命文物系统化管理体系

管理好革命文物就是延续历史根脉,是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基础条件。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实施“分区分类分级”精细化保管,为革命文物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家”,推动实现可移动文物征集研究、抢救预防、保护修复一体化、系统化管理。

一是实施分区分库保管。针对现有10.6万件/套馆藏藏品实际情况,开展分区域、分库房的规范化保管,主要设立文物保管区、藏品保管区,文物保管区包括纸质库房、器物库房、纺织品库房等,藏品保管区包括准藏室、图书库房、复制品库房、代用品库房、资料库房、档案库房等6个,同时完善库房新风系统、恒温恒湿系统、低氧杀虫系统,进一步优化文物管理微环境,安排专人进行管理。

二是实施分类分级保管。全面加强纸质类馆藏文物修复管理,创新结合古籍修复技术、书画装裱技术和新型丝网加固修复技术,突破双面文字纸质文物修复难题,采用针线加固法对出现破裂、残缺、糟朽等病害的纺织品文物进行保护修复,1个修复项目获评“2021年度全国十佳文物藏品修复项目”;着力强化纺织品、瓷器、木器、金属器等多质地类型文物日常管理;针对3891件/套珍贵可移动文物,实行分级分柜专业化管理,采用低温防爆冷光源,使用囊匣、RP袋、无酸纸袋等装具进行多重保护管理,同时,完善文物常态化巡查机制,加大巡查频次和力度,建立巡查管理台账。

三是实施数字档案保管。让科技为革命文物管理赋能,建立“文物数字档案”,对平面类文物进行高精度扫描,对实物类文物实行360°环拍,建立藏品信息管理系统。建立文物3D高清数据库,对革命文物本体进行精细化三维测绘、纹理采集及3D虚拟漫游模型制作,实现720°实景采集和全景漫游。对上万条的口述历史图片、音像史料

等进行数字储存,建成媒资管理系统。充分利用“红村云”平台,建立由馆藏、人物等6个子库组成的文物数据库,切实提高文物保管的信息化水平。

坚持以运用好为目的,推动“共建共融”,着力构建革命文物多元化传承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运用好革命文物就是传承红色基因,是做好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的最终目的。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用活革命文物,推动协同创新,促进共建共融,强化育人功能,充分发挥其在党史学习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构建革命文物多元化传承体系。

一是深挖文物资源,推动展示传播。坚持正确的党史观和唯物史观,深入挖掘每一件文物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出版《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物精粹》;针对南方特殊气候条件和易破损的文物建筑结构,开展“近现代砖木文物建筑营造技术与保护”等课题研究;强化红岩革命文物承载的红岩精神研究,推动红岩精神纳入首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让收藏于库房里的文物活起来,推出珍藏革命文献特展等精品展,打造红岩主题的城市文化客厅。让文物插上科技的“翅膀”,制作革命旧址纪录片《渣滓洞》;推出更多可视化呈现、互动化传播、沉浸式体验的服务,打造《红岩记忆》数字体验厅,让越来越多的人触摸到有温度的革命文化;研发《新华日报》等数字文创产品。承办“文物映耀百年征程”2021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

二是盘活文物资源,推动共享共融。“创新是第一动力。”坚持立足自身优势,盘活文物资源,推动跨领域跨行业融合发展,聚智聚力让文物“出圈”;参与发起成立全国革命文物展示联盟、全国红色基因传承平台;与40余家单位开展文物保护传承、资源挖掘利用等方面的合作共融,共建红岩精神研究中心、争创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联动“重庆革命遗址掠影展”“中国革命精神联展(1921—1949)”;联动打造“红色三岩”革命旧址的红色主题公园,着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红色文化新地标。

三是用好文物资源,推动育人铸魂。着力把丰富独特的革命文物资源转化为优质生动的教育资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革命旧址区扎实开展抗战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等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每年创新开展“红岩诗抄”“寻找红岩发声人”等特色活动上百场,年均接待观众600万人次。推动革命文物活化利用与青少年教育、党员干部教育紧密融合,建成红岩干部学院,把文物旧址变成28个现场教学点,每年培训上万党员干部;着力打造“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红岩沉浸式研学营地,每年培训青少年上万人次;创新开展“红岩革命故事展演”特色思政课,推动文物故事进校园、进学校,让革命文物在新时代绽放光彩。(作者系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委委员、副主任)

新时代文物工作



江西加快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建设

江西的革命遗址遗迹、旧

居旧址和各类纪念设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类别丰富、分布广泛、特色鲜明,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红色博物馆、红色学院”。近年来,在文旅部、国家文物局的关心指导下,在江西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各地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全省文物系统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文物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使命,守土尽责,坚定扛起革命文物保护运用传承的政治责任,推动革命文物工作取得新进展,迈上新台阶。

持续在政策保障上用劲发力。完善政策法规体系。率先启动革命文物保护立法,制定全国首部以革命文物为立法对象的省级地方性法规——《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在革命文物界定、多元产权处理、革命精神研究、红色资源传承运用等方面探索突破。《赣州市革命遗址保护条例》《吉安市红色文化遗存保护条例》相继施行,形成完整的革命文物保护法律体系,为新时代革命文物“保驾护航”。制定出台《关于加强革命历史类纪念设施、遗址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实施意见》《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实施方案》《关于推进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工作的意见》《关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保护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革命文物治理体系、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启动省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制定出台了《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县创建管理办法(试行)》。

持续在夯实基础上用劲发力。摸清全省革命文物的资源底数和保存状况,组织开展了革命文物名录核定公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长征文物资源调查、红色标语类革命文物专项调查,在全国率先公布江西省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第二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截至目前,全省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960处,国有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43650件/套,登记备案的革命专题博物馆、纪念馆65家,其中国家一级博物馆5家、二级博物馆6家、三级博物馆9家,核对登记的红色标语10748条,87个县(市、区)列入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分县名单。

持续在打造全国“样板”上用劲发力。实施“赣南等原中央苏区革命旧址保护工程”,争取国家支持项目750个,争取国家文物保护专项



资金10.5亿元,一大批革命遗址得到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与乡村振兴、民生改善、脱贫攻坚等融合发展,形成革命文物保护江西模式,经验做法被国家文物局大力推广。红色标语保护利用走在全国前列,出台《江西省红色标语保护利用工作规范》,形成一批红色标语保护利用优秀案例、示范展示点和研究专著。

持续在传播展示上用劲发力。全省各类红色场馆每年向社会免费推出150余个革命主题展览,7个红色主题展览列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精品展览推介名单,“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史陈列展”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特别奖。策划实施“五个一百”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组织开展了全省文博系统“‘喜迎二十大’十佳红色乡土教育课程”“同上一堂思政课——走进红色场馆 汲取奋进力量”等一系列思政活动,受到广泛好评。革命旧址沉浸剧《那年八一》系列宣传项目入选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精品,5地入选全国热搜革命类博物馆50强榜单,全省革命场馆的教育功能有效彰显,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有力提升。实施“两讲”规范工程,建立策展方案审批和讲解词研究审查制度,确保导向正确、史实准确、讲解规范。

持续在文旅融合上用劲发力。推出一批红色旅游经典景区、精品线路,全省有红色旅游A级景区51个,11个景区入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名录,5条红色旅游线路入选全国建党百年来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打造“红色+生态农业”“红色+休闲康养”“红色+非遗传承”等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红色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深度融合,让当年的“革命路”“长征路”,成为新时代的“振兴路”“幸福路”。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革命文物处)

秦简“疒”之防措以及其当代义释

王峰

探丙的鼻孔,不打喷嚏。臂肘和膝部……两脚不能正常行走,有一处溃烂。丙的手无毛。让丙呼喊,他的声音嘶哑。根据以上病理特征,确定丙确实患有“疒”即麻风病。

张家山汉简《脉书》中说:“四节疔,如牛目,麋突。为疔。”《黄帝内经·素问》卷十二亦言:“疔者,有荣气热附,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疡溃,风寒客于脉而不去,名曰疔风,或名曰寒热。”《素问·脉要精微论》:“脉风成为疔。”王冰注:“然此则癩也。”可见,古代典籍对“疔”这种疾病的病症描述与睡虎地秦简的记载大致相同。从现代医学对麻风病的界定也可知,古代的“疔”就是麻风病。这种传染病在中国古代较为普遍,并且严重危害了社会公共安全和百姓生命安全,在百姓中引起恐慌,引起了官府的高度重视。甲之所以送丙到官府,也许还与秦代的连坐法有关,如果知情不报,致使传染病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医生诊断疑似患者必须及时、专业、高效,随时听从官府召唤。这就需要百姓、患者、医生、官吏通力合作,任何一环都不能出错。

《封诊式·疔》为司法鉴定麻风病的典型案例,是一则鲜活的法医学教案。在医疗条件尚不发达的战国末期或秦代初期,有专门的医生随时听令,丁的工作类似于现代社会的法医的职责,这也说明秦代对传染病和公共安全的高度重视。在传染病发现之初,遏制传染病传播的最好办法就是隔离传染者,切断传染源。在隔离传染者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对可疑者进行诊断,这就是医生的职责和工作。因为传染病传播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医生诊断疑似患者必须及时、专业、高效,随时听从官府召唤。这就需要百姓、患者、医生、官吏通力合作,任何一环都不能出错。

重视防疫立法,最早建立隔离处理分类处置机制

在秦代凡是确诊患有麻风病的人,对他们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患有麻风病的人发往“疔罢(迁)所”集中隔离。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

123简:“城旦、鬼薪病,可(何)论?当罢(迁)疔罢(迁)所。”城旦、鬼薪既有轻罪之人患麻风病,应迁往麻风病隔离区。“疔罢(迁)所”是指专门隔离麻风病患者的地方,这是杜绝麻风病传播的有效办法,也是处置麻风病患者常见的主要方法。“疔罢(迁)所”的出现,说明早在秦国晚期或秦代,就已经有了专门处置传染性疾病的机构。二是“定杀”,即把患者置于水中淹死。《法律答问》121简:“疔者有罪,定杀。”“‘定杀’可(何)如?生定杀水中之谓殴(也)。或曰生理,生理之异事殴(也)。”麻风病人犯罪应该定杀,就是活着投入水中淹死。或者认为是活埋,但活埋不合律文本意。

《法律答问》123简主张把麻风病患者淹死,《法律答问》121简主张把麻风病患者集中隔离。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原因有二:一是123简是城旦、鬼薪染了麻风病,犯罪在前,患病在后。121简是疔者有罪,患病在前,犯罪在后,有知错犯错之意,所以要“定杀”。二是123简中城旦、鬼薪都是轻罪,轻罪者染了麻风病,依照罪行应当迁往隔离区隔离。121简只说“疔者有罪”,疔者犯的“罪”有可能是重罪,根据罪行轻重,应该判死罪,所以执行被淹死的处罚。“定杀”主要是根据犯罪的轻重来做出的处罚,它并不是处置麻风病的主要方式,也不见于其他秦律的律文。

《法律答问》122简记载:“甲有完城旦罪,未断,今甲疔,问甲可(何)以论?当罢(迁)疔罢所处之;或曰当罢(迁)罢(迁)所定杀。”对于犯有完城旦罪而尚未判决的麻风病患者,有两种处置方式:一是迁往隔离所隔离,二是迁往隔离所淹死。把麻风病患者迁往隔离所集中隔离这种处置方式放在前面,“定杀”放在后面,这表明,集中隔离是通行和常用的方法,这与《法律答问》123简的处置方式是相同的。

秦代“疔”之防治举措的当代义释

第一,畅通上报机制,及时切断传染病的传

染途径。在《封诊式》中,某里的甲送来了该里的丙,只因甲根据丙的生理特征,怀疑丙患有麻风病。官府立即命医生丁检验,证明丙确实患有麻风病。甲的做法,很好地阻止了麻风病的传播,既保护了自己,也使丙得到及时治疗。

第二,做好宣传引导,提高百姓的自我防范意识。在《封诊式·毒言》中,甲等二十人把同里的丙押送到官府,认为丙患有毒言这种传染病。今日看来,这是一种迷信。但他们对于丙的防范工作值得我们借鉴。诸如,丙家里有祭祀活动,邀请甲等人来,甲等人不肯来。甲等人家里有祭祀活动,也不肯邀请丙参加。即使共同参加社里的祭祀活动,他们都不肯与丙共用饮食器具,也不肯和丙一起吃饭。

第三,加强立法工作,依法做好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睡虎地秦简内容大部分是秦代律法和文书。《法律答问》和《封诊式》中都有对“疔”即麻风病的记载,说明秦代对传染病的防治工作已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也表明秦代对传染病的重视。在今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及时颁布法律规定,建立完善法治机制,并在实际中要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凡有触犯有关疫情防控方面法律的,一定要严惩不贷。

第四,倡导科学防疫,建立可行的规范的防治程序。一旦有疑似麻风病患者,秦代官府就会立即让医生诊断,并且将诊断的依据详细列出,具体到人的五官、肢体和声音等诸多病理特征。还要把押送患者的人的姓名、身份、籍贯记录在册,这既是判断病情必须走的程序,也是为了更好地掌握潜在的感染者,切断感染源。麻风病患者一旦确诊,就会被送到麻风病隔离区,避免传染给他人。这种及时诊断、精准研判、详细记录、迅速隔离等防治措施,仍有借鉴价值。秦代这种隔离防疫的方式、服从管理的文化,虽说简单直接,但可保证抗疫的成效,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与健康。



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大量竹简,被称为“睡虎地秦简”,又称“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简,大部分完成于秦始皇时期,反映的时代是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其内容多为秦代的法律和文书,不仅有实体法的秦律,而且有解释律文的问答和有关治狱程序方面的律法文书。其中对“疔”即麻风病进行记载的竹简有《封诊式》52—54简和《法律答问》121—123简,这是研究我国古代麻风病历史的珍贵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秦简中对麻风病的防治举措,时至今日,仍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